

唐韵胡音

葛承雍 著

与外来文明



Tracing exotic civilization in
Tang's rhyme and
Hu's melo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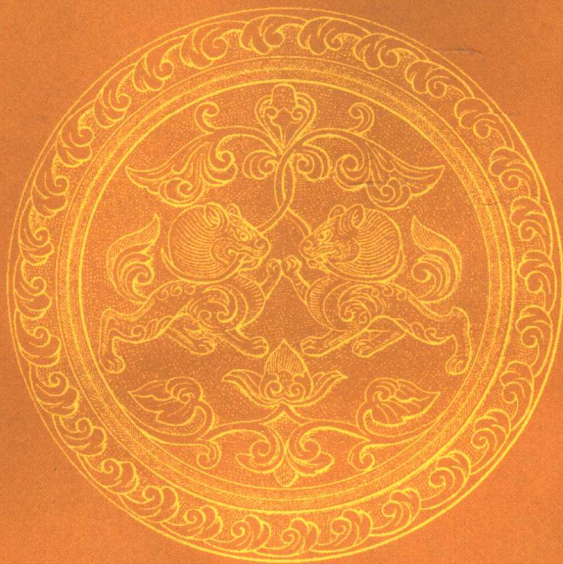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

Tracing exotic civilization in Tang's rhyme
and Hu's melody

葛承雍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 / 葛承雍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ISBN 7-101-05053-0

I. 唐... II. 葛...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K24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578 号

书 名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

著 者 葛承雍

责任编辑 朱振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053-0/k · 2210

定 价 80.00 元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聆听唐韵胡音 感悟外域来风 5

综论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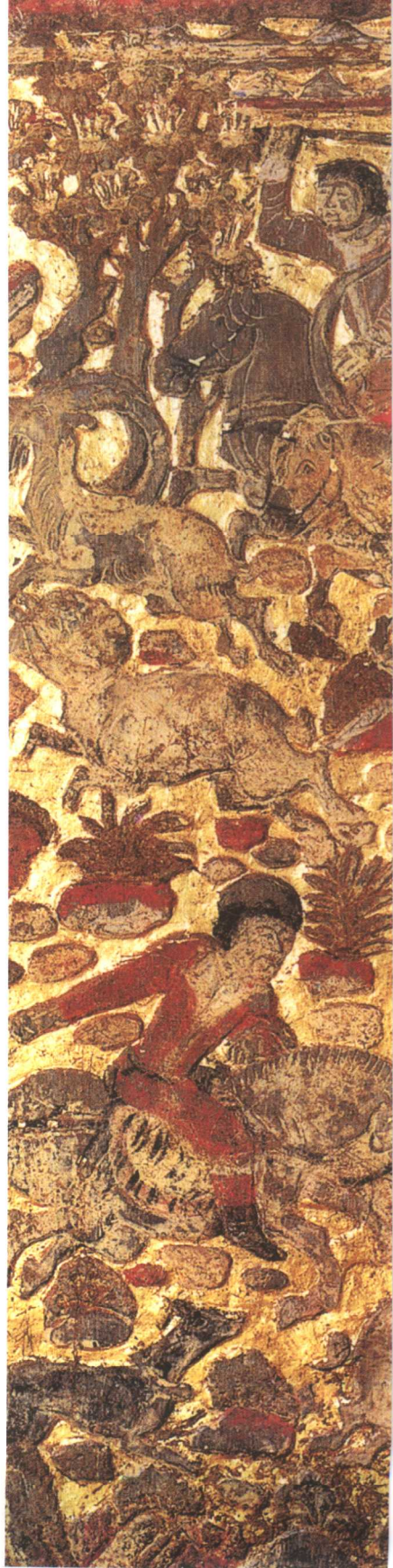
- 1. 论唐朝的世界性 12
- 2. 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 26
- 3. 谈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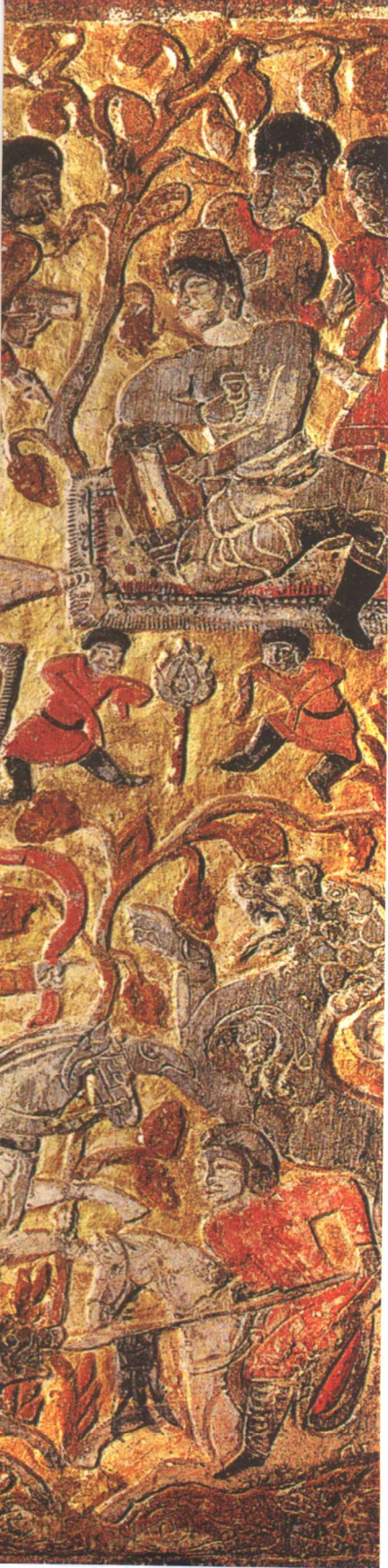
民族篇

- 4. 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 44
 附：谈崔莺莺身世角色的探索 60
- 5.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66
- 6. 唐宋时代的胡姬与吴姬 78
- 7. 唐长安黑人来源寻踪 92
- 8. 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 112
- 9. 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正 ... 130
- 10. 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 140
- 11. 考古新发现唐长安一方契丹王墓志的解读 148

文化篇

- 12. 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 158





- 13.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 180
- 14.唐代龙的演变特点与外来文化 198

宗教篇

- 15.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 212
- 16.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 232
- 17.唐代景教传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 .. 242
- 18.祆教东传长安及其在陕西的遗痕 252
- 19.唐两京摩尼教寺院探察 270
- 20.唐长安伊斯兰教传播质疑 280

建筑篇

- 21.唐华清宫沐浴汤池建筑考述 292
- 22.唐华清宫浴池遗址与欧亚文化传播之路 308
- 23.“胡塹”传入与西域建筑 318

语言篇

- 24.唐长安外来译名Khumdan之谜 328
- 25.Khumdan为唐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 334
- 26.中亚粟特胡名“伽”字考证 342

附录

- 英文目录暨提要 349
- 相关论文发表刊物与时间 371

后记

- 寻找失去外来文明的碎片 374

前言

聆听唐韵胡音 感悟外域来风



1971年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



前言

聆听唐韵胡音 感悟外域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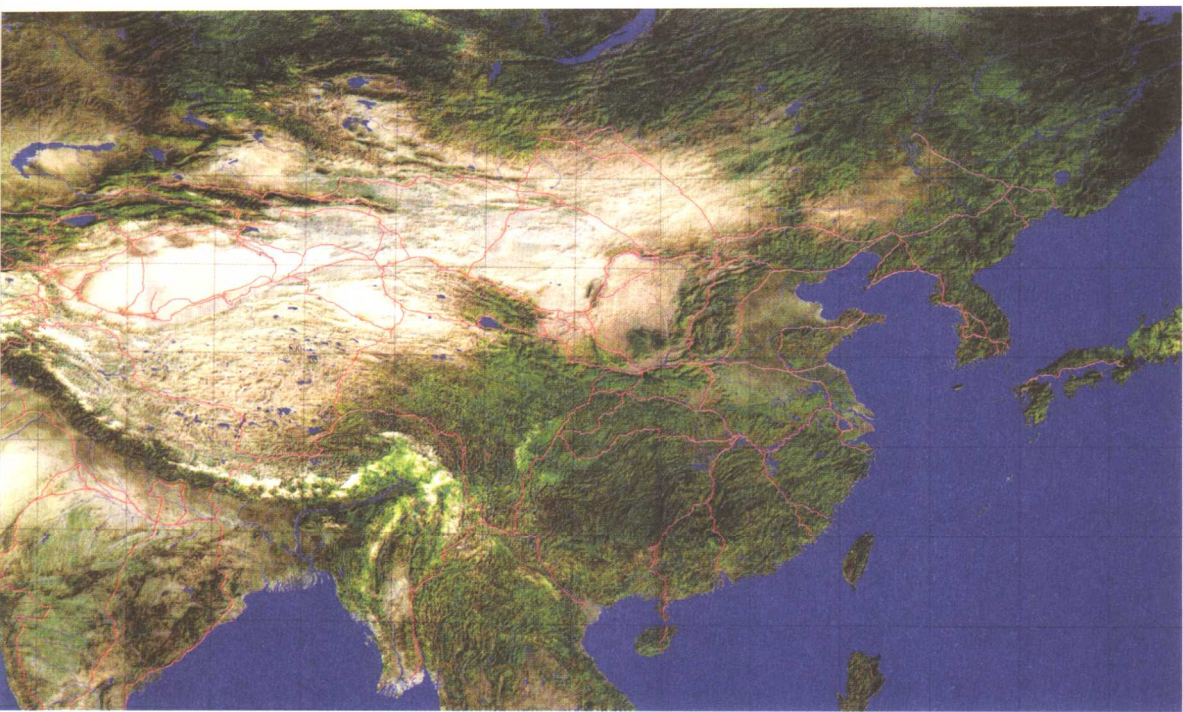
文物是民族文明的印迹，是先人文化遗产的履痕，使环环相扣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有了重要的一环。尽管许多文物并不载于正史和古书，甚至语焉不详，但它更言之凿凿，具有庄严神圣感。如果说出土文物是死的过去的东西，那么经过人们发现、好奇、喜爱、研究，文物好像复活了生命，所以出土文物又不是僵死的。我们从中古时代镌刻着异域文化遗痕的文物中，从散发着浓郁胡人生活气味的文化中，发掘被岁月湮没的外来文明，唤回消逝的唐韵胡风，赋予它新的生命，追踪积聚饱满内容的大历史，留下“正统史书”上失踪者的另类历史，这是我们“复活文物、昭示未来”的应尽责任。



丝绸之路航空遥感地图（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提供）

记载文明的文物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铺陈排列，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实物见证，而是对历史的透视，是历史永久性和瞬时性的结合体，既有人类发展的线形轨迹的属性，也有凝固于各时各点的散射特点。文物并不是不受当时历史条件和任何规律束缚的，它必须满足当时人的欣赏兴趣，有什么文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创造。胡汉之间，无论是官府工匠还是民间技人，创作制造时往往要以当时人们的喜爱倾向为标准，体现本民族的风貌和骄傲，显现自己的文化灵魂和信念。不同文明之间留下的对话、交流、融会，往往是促进文明发展的直接动力。

秦汉以来传统的历史书写，史家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以中原汉族为中心，而将其他族群边缘化或干脆放逐到历史书写的视野之外，似乎要净化一切“胡化”外来的东西。这样的历史书写当然不能说完整地记录了历史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历史遗迹的挖掘和历史文献的重新发现。所以，人们期待着考古学家的铲子能



够科学地发掘出更多的文物，通过文物所具有证史、补史、纠史的独特作用，使得历史书写能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重绘汉唐之间东西文化交流的地图。

博大疏阔的唐文化就不是很传统的汉民族韵味，泱泱唐韵中搀杂着缕缕胡音，融汇了许多异域文化的渊源，吸纳了诸多外来文化的因子。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惟有唐文化最具有这种外来的胡风野性，多元浓烈、磅礴奔放。有的西方学者说过，胡人是动物性格、草原文化，汉人是植物性格、农业文化；胡人喜欢冒险开拓、冲突碰撞，家乡就在游牧马背上，随水草迁徙四海为家，随商贸利益四处移居；汉人安土重迁，固本守己，提倡叶落归根，不愿轻易闯荡；胡汉生活性格和文化差异是明显的，从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的日常生活到绘画、石雕、陶塑的艺术创作均有不同的表现，然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又是逐渐融合的，这在唐代历史发展脉络中是非常清晰的。

本书中的专题大多围绕唐代长安与外来民族文化有关出土文物而写，这不仅是因

为长安出土的异域外邦文物丰富、品级很高，更重要的是长安作为汉唐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古代强盛时期熠熠生辉的名片。这片神奇土地上仿佛散发着胡汉交融的阳刚地气，每每看到这里新发现的文物，人们心中总有一种阔大之魂的震动感，文物背后拖着历史遗产的巨影，这是我们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年月，是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最频繁的时代，与后世宋元明清无法类比。

在回望唐代三个世纪的行程时，我常常感到与外来文明有关的文物研究或者历史描述中，总留有不少未知空白需要探索填补，有的星星点点扑朔迷离，有的底色覆盖晦暗不明，这一方面因为中外交流史料零散匮乏，另一方面也因为外来语言破解的困难，所以梳理起来费工耗时，百年来许多中外学者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值得我们永久怀念。我把这十几年专题汇集起来的动机，是因为不断有读者朋友向我索要这些文章和注脚出处，为了回报他们，为了不被时间淘洗，为了历史遗产不被忘却，蹒跚坎坷，现总算编成了。

本书分为六个篇章，分专题追索出土文物中与外来文明有关联的问题。

综合篇的3篇文章，主要从宏观大视野上论述了唐朝世界性的特征，分析了丝绸之路贯穿东西方的特点，对古今中亚一脉相承的起伏影响作了简要论述，利用重要考古资料来深化人们对丝绸之路的新认识，并对唐长安作为丝绸之路巅峰时代的起点谈了自己的理解，或许对丝绸之路整体串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所启迪。

民族篇的8篇文章，分别依据考古文物和唐宋史料从不同角度对唐长安黑人来源作了寻踪考证，说明当时的黑人并非来自非洲，而是来自南海诸地域，改变了人们过去的认识，曾被多家新闻报刊转载介绍。对唐长安印度人研究则结合已发现与其有关的文物进行了梳理，证明印度人在中国为数不少。外来西域女性“胡姬”与江南水乡女子“吴姬”的对比互动，表现出南北不同文化的流风余韵，提供了许多史书没有记载的南北方独特情艺生活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沿着陈寅恪先生对崔莺莺身份的三条推测思路补充了五点新证，论证崔莺莺原型曹九九实与蒲州粟特移民有关，此论被十多家新

闻报刊转载介绍，引起了从事古典文学史研究的一些人强烈反映，也算是近年学术界的一场小风波，有兴趣翻翻的读者不妨见仁见智，任凭褒贬。3篇对外来民族人物墓志的考证文章，按当时唐朝周边地区来说都是异域，也属于疆域之外投奔入唐的移民，他们的人生际遇反映了唐朝对外民族政策的前后变化。

文化篇的3篇文章，前两篇从闻名于世的唐昭陵、乾陵石雕入手，分析了石雕的来龙去脉，说明唐初突厥丧葬中建立石人风俗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对“昭陵六骏”名称的考释，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破译了突厥语的来源，被二十多家海内外新闻媒体所介绍评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至今海外突厥学研究者仍在不断索取原发表的刊物。关于唐代文物中龙形象有飞翼的外来文化影响的考述，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兴趣，后收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辑的《龙与中国文化》一书。

宗教篇的6篇文章，分别从出土文物研究角度论述了景教、祆教、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其中《唐代长安一个粟特的景教家庭信仰》被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后发表在欧洲东方学刊物上，引起欧洲基督教和宗教界学者的关注。对唐两京摩尼教寺院所在坊里的分析推测，还有待今后考古发掘的最终证实，但指出了可能的位置。最后一篇文章对伊斯兰教在唐长安传播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从目前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来看是不可能的。

建筑篇的3篇文章，有两篇考述了唐华清宫浴池建筑遗址考古发掘后的新认识，结合世界文化遗产中各国古代浴池建筑遗址的分布，说明其石砌形制与欧亚文化传播有密切关系，其中一篇应约在台湾《历史》月刊改编后首次发表。对西域建筑中广泛使用的“胡塹”传入中国北方地区，作了较详细的考证，曾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其他报刊转载介绍。

语言篇的3篇文章中，第一篇主要对明末出土景教碑上长安外来译名Khumdan（胡姆丹）这个千年之谜进行了解释，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新观点。第二篇则利用新出土文物中粟特文字的明确记载，继续补充Khumdan就是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纠正了以前不

正确的一些推测解释。最后一篇是西安北周安伽墓发现后，对粟特人名中“伽”字含义的解释，说明粟特人名不仅是一个人生符号，而且蕴涵传递着文化、政治、宗教等种种期望追求的含义。

为了开阔文化视野，拓展学术领域，唐代华韵胡音珠联璧合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口，前辈学者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冯承钧、张星娘等先生在当年出土文物还不如现在丰富多彩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坚忍不拔，已在中西交通研究、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内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外国学者做出的先驱性研究成果亦是伏涌延绵，并影响着后来者继续探索推进。尤其是近年中国境内与中古外来文化有关的文物不断发现，一些前沿性的学术课题也应运而生，亟待我们进行认真研究，缀合一个个出土的珍贵文物信息，重新审视和再现大历史的真实面貌。本书汇集的专题重点也大体在这个范围，算是百年接力、越代相师的继续吧。



2002年西安南郊唐墓出土三彩
载物卧驼俑

综论篇

1. 论唐朝的世界性
2. 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
3. 谈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

论唐朝的世界性



1987年陕西陇
县党家庄出土
唐代大胡须
胡人立俑

学术界往往爱将秦汉与隋唐类比，特别是“汉唐”作为同一循环的连称，频频使用于历史文化的学术著述中。因为汉与唐同为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统一王朝，如果说汉朝是杂糅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各种要素和秦帝国将各种矛盾统一于一起基础上建立的王朝，那么唐朝则是融合南北朝时代产生的各种要素和隋帝国统一南北基础上建立的又一个王朝，所以汉唐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立足于当时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性来观察，就会发现汉与唐是本质上差别很大的王朝。其差别是：汉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朝代，由境外迁入的人口很少，混杂周围其他民族血液的人口也较少；而唐则是南北朝“五胡融华”后大幅度民族更新的朝代，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唐人血管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汉代经常遭到匈奴的侵扰，但匈奴掠夺后还会回到草原上生活；唐朝也不断受到突厥等边族的抢掠，可是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中原聚居。汉朝时还没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文明魅力建立对周边诸国的宗主权、仲裁权，其史书记载的“天下国家”有着较具体的意义，而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来自西方造型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希腊人名为“来通”

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汉朝国力富足是以官方积聚为代表，《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百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唐朝国力强盛则是民间普遍充足，《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汉代管理西域设“都护”、“长史”，统领督察诸国，范围最远到达葱岭；唐代统治西域也设有安西四镇和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稳定地设在龟兹王城近百年之久，范围越过葱岭以西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两个圈子，一小一大，并不相同。

以上这些差别不仅是由于汉唐两个时代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也是汉人与唐人对周边各族的民族意识不同，天可汗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并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歧视偏见和民族界限。这也正是我们要用“世界性”来表述的关键，因为“世界性”不仅指要推倒开放实际的国境边界，而且也指要摧毁心理的信念和民族之间的壁垒。从世界整体结构上来说，各民族的互相影响和各国间的自由交流，既可以使一些中心强国自身综合实力得到增长，也可以推动邻近国家社会文化及各方面的发展。

唐朝超级“帝国”的地位在亚洲正是起了这样的巨大作用。

让我们对唐帝国的世界性作一具体的分析。

我认为，唐朝广阔的疆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不仅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而且以综合国力参预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控制权。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非常注意中外交流，即国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除中亚的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等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约有39次，拂菻(拜占廷)使节有7次，师子国(斯里兰卡)使节有3次，日本遣唐使有14次，林邑24次，真腊11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丽、百济)、婆罗门(印

度)、泥婆罗(尼泊尔)、骠国(缅甸)、波斯以及西亚、北非诸国等等，都非常普遍，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开阔。唐朝法令规定，

“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2]并要求外国使者说明道路远近、国王名称等。对外国使节的往来迎送也有明确规定：

“诸蕃使往来道路，公私不得养雇本蕃人及畜同色奴婢；亦不得充传马子及援夫等。”^[3]即不允许唐朝地方政府和私人雇用外国使臣携带的随从以及侍候奴婢，既保证外国使节的路途往来使用，又防止向外国泄密唐境内重要情况。

唐政府也频繁地积极派出使臣出访周边各国，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武则天圣历三年(700)诏令：“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乃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

骑马抱犬狩猎胡俑，
1991年西安东郊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4]开元四年又详细规定：“靺鞨、新罗、吐蕃先无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5]唐朝出使北天竺(印度北部)的王玄策，出使日本的郭务棕，出使吐蕃的李道宗等，都是著名的外交家。

唐长安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和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迎宾馆、礼宾院，不仅负责一切接待事宜，而且入唐后供给资粮。《唐会要》卷一百记载证圣元年(695)敕令：“蕃